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逻辑

魏有兴,刘 航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与过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恢复与调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完善与发展三大阶段。将“背景-结构-互动”范式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研究,为分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以此揭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演进过程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和行动机制。展望未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立足“两个大局”,拓展全球视野;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延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社会空间;利用制度弹性,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特色化发展。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课程设置;演进逻辑;“背景-结构-互动”范式

中图分类号:G41;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6-0026-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设置与演进呈现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七十多年的演进过程,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需求特征。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演进研究,基本是依据时间轴来梳理其嬗变,且大部分遵循历史演进过程-经验总结-现实启示的逻辑线索展开论述,研究方法和路径较为传统。分析现有文献可知,学界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看作一项制度安排,但是从制度视角研究其演进逻辑的成果较少。鉴于此,笔者通过梳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演进历史,借鉴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试图构建一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演进的“背景-结构-互动”分析范式,据此探究制度演进背后的深层逻辑,以期展现一个

更加全面、立体的制度演进过程。

一、“背景-结构-互动”范式的引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而逐步确立并完善起来的,其演进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着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本身,立足宏观社会背景,着眼中观变量结构,同时关注与之相关的微观制度主体,尝试提出一个适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演进的理论解释,即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

1. “背景-结构-互动”范式的内涵阐释

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是在借鉴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2020年人文社科专项重点项目(B200207084)

作者简介:魏有兴(1975—),男,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yxwei@hhu.edu.cn

制度主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范式创新。制度主义主张用“前后因果关系”的分析范式来理解制度及其产生过程,并将结构论的宏大叙事限定在中观的、可把握的制度之上。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研究中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却又不同于制度主义,它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分析宏观社会背景、中观变量结构与微观行动者主体对课程设置制度演进产生的重要影响,以此探究课程设置制度的演进机理。

首先,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也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不同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所选择的宏观背景,这些要素是推动课程制度改革的外部动因。作为上层建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必然受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尤其是生产力要素的影响。生产力的变化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发展。当然,宏观社会背景并非直接作用于课程设置制度,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作用的发挥,继而影响课程制度改革。

其次,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既有交叉也有平行,具有丰富的存在形态和复杂的运行体系^[1],这就决定了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并非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中观变量结构是指除宏观社会背景之外对政治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中观制度环境,如经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方面,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做出调整,以加强和巩固意识形态建设;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变革事实上与国家教学课程决策体制、课程管理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推动课程改革的中观变量结构。

最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调整演进虽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受益于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但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而自发地实现和完成,还要考虑学生思想发展状况,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契合学生自身需要,才能得到广大学生认同,从而实现课程育人价值。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变革是一项专业化的社会实践活动,需借助于人的力量,通过制度相关主体如政府、专家学者、高校等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2. “背景-结构-互动”范式的基本方法

“背景-结构-互动”范式的基本方法,即主张将制度作为中心,同时把历史过程纳入制度研究视野,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分析宏观社会背景、微观制度主体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因素,对制度演进产生的重要影响,以此探究制度的演进机理。基于此,利用“背景-结构-互动”范式进行制度分析时,应始终强调把制度置入历史,通过使用探索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政治结果的解释。因此,了解制度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成为制度研究的前提基础。此外,该范式从多维视角分析制度变革的动因,这恰为制度演变史的梳理提供了新思路,即可将多重影响因素的地位及影响程度作为划分制度发展阶段的依据。具体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考虑其产生的背景和课程性质的特殊性,可将历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的宏观时代背景作为对其产生普遍性影响的重要动因,同时兼顾关键性时间节点,以此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

3. “背景-结构-互动”范式的适切性

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为解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两者具有适切性。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发展过程从来就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而是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这与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所主张的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研究制度的演进相契合。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演进动因是制度复合体以及多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单维分析视角解释该制度演进的低效性,而“背景-结构-互动”范式恰好囊括了宏观社会背景、中观变量结构、微观主体互动3个不同层面的不同分析视角,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课程设置制度的演进逻辑。综上所述,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能够为深入剖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演进提供分析框架,即以“背景-结构-互动”范式作为理论依据,将其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研究,以探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演进逻辑。

二、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图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始终伴随新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向前迈进,在其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数次调整。然而,无论课程内容如何变化,课程主旨始终与党的治国理政需求、社会发展需求、课程建设需求和学生个体成长需求相一致。基于“背景-结构-互动”范式的基本方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过程受多重因素影响,但这多重因素归根结底是在需求导向的影响下发挥作用。需求导向始终贯穿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发展过程,成为推动课程发展的主线。以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过程划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大发展阶段,每一发展阶段都呈现不同的需求导向特征。

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与过渡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明确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本位价值,会议提出新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这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原则。1952年,第一个全国性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52方案”形成,该方案课程包括了“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基础课”(实际是“苏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国革命史”等。之后,受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冲击,1957年起开始“大鸣大放”,停开此前一切政治理论课,只设“社会主义教育”一门课。1961年,为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稳定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52方案”,形成了以“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为主要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简称“61方案”)。这一时期,主要受当时中苏关系以及“以苏为鉴”思想的影响,课程体系经历了“去苏联化”和“中国化”过程。随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陷入停滞。这一时期的课程教材逐步从国家统一管理向各高校自行组织编写的方向发展,教学活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教育指导思想,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才逐步走上

正轨。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受到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制度管理模式、法制缺失、高校及教师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当时课程制度变革的动力结构,形塑了这一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形态,使得课程设置呈现鲜明的社会本位特征。该时期虽未真正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但也极大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奠定了基础。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与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以人为本”思想逐渐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青年群体思想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党和国家逐渐意识到关注青年学生个体思想发展需求的重要性,因此这一时期课程设置的个体需求导向特征逐渐显现。

1982年10月,为应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教育部要求在高校新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从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形成了“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格局。198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简称“85方案”)下发,“85方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同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教育相结合,使学生在了解历史中关照现实,同时强调加强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需因校制宜,以更好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青年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1998年6月,《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简称“98方案”)出台,对比“85方案”,“98方案”中缺少了历史课程的教育,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诸多现实问题接踵而来,这一状况对青年学生思想造成了极大困扰,因此这一时期更加强调人们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而将历史教育放在了次要位置。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教育部于2005年2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简称“05方案”),其完善之处表现为:一是将原“98方案”中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旨在加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理解;二是将原“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充分体现我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要求;三是在原“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基础上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四是增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意在使学生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理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05 方案”之后,教材建设突出强调统一性,而不像此前一样可自行编写,这一举措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性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05 方案”及其之后所开设的部分选修课,再次通过制度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对课程的自主选择渠道。此外,为提高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05 方案”还将大学生社会实践正式纳入课程教学计划。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学生思想发展需要等因素影响较大。课程设置不再一味地以社会需求为主导,而开始关注学生个体发展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逐渐趋于稳定和规范,并朝着体系化科学化方向迈进。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善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求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另一方面,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下,各种不稳定因素深刻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想,因此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武装青年学生的思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为我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必然选择。

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同时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中的诸多问题,2015 年 7 月,《关于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出台,提出了新的课程建设指标和标准。2016 年 12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为深入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教育部于 2017 年部署实

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专项工作,要求高校思政课进行“大调研”,推动“大提升”,构建“大格局”。同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教育部设教材局,直接加强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管理。2019 年 8 月,《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出台,提出要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程群建设,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可各具特色,并强化了学校和教师的主体性。从 2021 年上半年开始,相关部门以教材改革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校思政课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了及时在思政课教学中充分体现党的创新理论成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历经 4 次调整,形成了 2013 年修订版、2015 年修订版、2018 年修订版和 2021 年修订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变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等密切相关,既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又关注学生个体成长成才需求,是对时代发展变化和治国理政思想的积极回应,符合制度发展规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国家不断坚持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程,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讲好“大思政课”。依据“背景-结构-互动”范式可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课程本身并不会随着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自发实现调整与变革,最终还是依靠行动主体的决策和落实。行动主体的决策在课程演进过程中扮演着“总导演”的角色,由谁来决策、如何进行决策则影响着课程调整的方向与内容,并最终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总体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制度演进过程符合制度发展规律,并在这一规律指引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建设经历了“统-分-再统-再分”的过程。课程设置之初,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国家作为决策主体,重视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统一管理。20 世纪 90 年代,伴

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逐渐弱化决策主体者身份,逐步放开课程建设权利,不设统编教材。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一般由各省级教育部门、高校及教师等在符合当时教学大纲或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自行编写,制度弹性赋予了课程内容一定的灵活性。“05 方案”时期,全国使用统一教材,再次加强课程管理。进入新时代,教材局的设立加快推进了教材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同时,课程群建设的实施,再次扩大了各高校课程建设的自主权。看似是课程设置本身的变化,实则蕴含着决策权的变化。

决策同课程本身一样,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需求”则贯穿这一过程的始终,成为影响课程调整的主要因素,在课程的制度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发展需求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影响课程调整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的“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的教育目的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课程内容是其具体表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给学生思想带来复杂影响,这时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需求导向逐渐成为课程设置与调整的主要依据,所开设的各类思想品德课程、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课程则是对学生思想发展需求的积极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表现为两者并重,既立足社会发展目标,又着眼学生成长成才发展需要。总体而言,需求导向始终贯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发展过程,成为推动课程发展的主线。

三、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机制

将“背景-结构-互动”范式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研究,为深入系统地剖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演进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从此范式出发,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制度演进历史,以此来揭示其演进过程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和行动机制。

1. 各种外在驱动因素有机组合的动力机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演进的动力机制指的是驱动课程制度变革的各种外在动力因素的有机组合。通过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

式进行分析可知,动力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社会环境、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以及学生个体发展需要。

(1) 宏观社会背景之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宏观社会背景的变化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影响明显:一是外交政策的调整变化使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设置上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很大,之后伴随中苏关系变化,使得我国不得不自行设计课程体系和内容。此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走上中国化道路。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课程设置模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实施。三是法制的影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法制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这使得当时的课程设置人为因素较大,规范性不够。虽规定设置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但实则对其内容进行篡改,理论教学的科学性遭到破坏,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运动,政治性成为其主要特征,学理性而其次,甚至不考虑。纵然政治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质属性,是一切课程变动调整都应遵循的价值底线,但学理性则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逻辑起点^[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一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引领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恢复了此前的“61 方案”,但由于“文革”造成的巨大思想冲击,人们在走出过去的思想禁锢后却面临着茫然与困惑。因此,这一时期国家非常注重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98 方案”所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则更为关注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为迅速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统一思想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带来了高等教育反哺投入,使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获得巨大的物质支撑。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潮对我国青年学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此时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三是随着依法治国重大战略的推进,在确保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逐渐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步入了深化创新的新阶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我国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一方面,高等教育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一环,深刻影响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另一方面,我国依然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意识形态工作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尤其是国家对青年学生胸怀“两个大局”的要求,使得思想阵地建设尤为重要。因此,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創新,进一步提高课程质量,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武装青年学生头脑,具有战略性意义。

(2) 意识形态建设之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性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内容。“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前进一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同时也是思政课程设置调整的根本动因^[1]。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历次调整,可以发现,每一次的重大调整都与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其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都直接或间接地内构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性发展。例如,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98 方案”随即开设了“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相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22 年秋季学期起,在大学本专科增设必修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因此,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不断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丰富课程体系内容,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现与时俱进。

(3) 学生个体发展之需

一方面,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目标群

体,高校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认同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完成与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只有深刻把握学生思想发展特征和变化,及时回应学生的现实关切,有的放矢进行教育,才能提高育人效果。回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改革历史,可发现学生发展需要是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演进的又一动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受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大学生对建设未来社会充满了无限热忱和向往,他们更加渴求知识,更加认同党的领导,并对马列主义表现出普遍的拥护,这间接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发展,“52 方案”和“61 方案”的课程设置就是对此时大学生思想发展需要的积极回应。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更加重视个体的发展,大学生群体开始关注个体与自我,并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有所衰减。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以及社会出现的个别不良现象,给青年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和迷茫。为此,根据新的社会形势与学生发展的需要,课程内容融入了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课程。2004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 16 号文件)及 2005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出台,进一步凸显了学生需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变革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强调要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教育部要求高校思政课要进行“大调研”,并提出构建“十大”育人体系,推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等,都离不开对学生需要的关注。

2. 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作为一项系统的国家教育工程,立足国家、社会和学生发展需要,从宏观制度背景、中层结构、具体行动实施等层面全方位展开。其中,课程设置制度演进中的决策至关重要。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不仅能够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社会的对话,更能最大程度地提升课程资源的利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动态的发展视角,投射出课程设置演进的发展之道,明晰了不同主体对于课程制度演进的重要影响。回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七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其中关涉的课程制度决策主体主要包括国家教育部

门、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目标确定、内容设置、实施、评价等均由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统一直接管理,这种自上而下的课程设置制度决策模式突出了国家在课程决策中的权威地位,课程内容强调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纵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演进历史不难发现,这一价值导向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直至影响后来的课程制度建设。这种课程制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运行,强调了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利于党的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决策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形成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三位一体的课程决策模式。这种课程决策模式强调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也应成为课程决策的参与者,这是我国规模巨大、内在同质化有限、多元化趋势日益强化等社会结构特点对决策体制要求的必然回应^[4]。

随着社会生产各部门分工的细化,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增强使得一项任务的完成越来越依靠不同部门和岗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合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改革亦是如此。从课程改革的一般规律出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大致要经历课程形成的前期准备、课程方案的设计与论证、课程的合法化与采纳3个阶段。由于课程设计本身的专业性、复杂性及其后续工程运作系统性特征,相关工作不仅需要教育行政机构的统一领导部署、各高校的支持配合,更加需要教育研究机构、智囊机构、专家学者、教师代表等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这些主体不仅要参与课程信息的搜集、课程目标的确立,更要投入课程内容的选取、课程教材的编写、课程方案的调研等一系列影响课程制度最终形成的后续活动。如,为了使“05 方案”更符合实际需要,由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成立了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在全国几乎所有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调研工作,调研重点主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宏观管理等,调研时间长达九个月。与此同时,“05 方案”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由学术带头

人任首席专家,理论研究人员、教学人员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组成的编写队伍,编写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2021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成立 2021—2025 年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组织设立咨询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 11 个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其实质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挥咨询、研判、督查、评估、培训、示范、指导、引领等作用的专家组织^[5]。由此可见,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作为课程决策的智库而存在,直接参与课程建设的决策,并承担课程政策文件、教科书编写等具体事务职能,通过对知识、思想的生产加工,强化了专家学者在课程变革中的作用,实现了“理论主体”与“决策主体”的相统一。受益于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通过实地调研—集体审议—对话协商的方式,一方面保证了专家学者课程改革的话语权,为课程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专业支持和智力保障^[6];另一方面在调研决策过程中允许不同主体参与,充分表达意见,并采纳合理建议,使人民群众的呼声得到积极回应,在“百家争鸣”中,课程主体逐渐从意见分歧达成意见一致,体现了课程决策的民主性。

3. 统一性、自主性和特色化有机结合的行动机制

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不仅关注宏观背景和中观变量对制度演进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强调制度与行为主体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一方面,制度规范和约束行动者的行为空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行动者行为的变化对制度调整提出了要求。行动者与制度之间的双重互动不断推动制度变迁。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演进的过程来看,关涉到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专家学者、高校及其教师,由于专家学者是在政府统一组织下参与决策且最终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因此从政府、高校及其教师这 3 个层次分析制度演进的行动机制。概括来说,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建设是统一性、自主性和特色化的有机结合。

首先,政府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演进中扮演着“总导演”的角色。作为课程改革方向的引领者,无论在任何时期,政府始终是主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演进的主要力量,直接决定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设置、教材编写、课程实施、课程考核以及评价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统一性的决定力量,保证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顺

利实施。

其次,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行动主体,高校也是制度演进的实践者。一方面,高校通过特定的信息沟通渠道,积极向政府表达在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实施中的建议和做法,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制度变革提供实践意见;另一方面,高校利用自身特色和优势,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实践主体,高校在具体落实各级政府有关课程制度建设项目的相关安排中,不仅作为执行者,同时也是创新者。例如,1978—1984年的过渡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无统编教材,但有教学大纲,允许各高校自主选择,既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大纲自行编写教材,也可使用教育部推荐的教材^[7]。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教学大纲并未根据高等学校本专科和文理科等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的要求进行编写,编者指出在使用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8],这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各高校及其教师的主体作用,尤其是教师作为教材的编写者、课程内容的传播者以及高校政策的建议者,其对于课程的理解直接影响了课程内容的选取。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详细规定了完善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的各项要求,并提出要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程群建设,一方面旨在严格教材建设与管理,另一方面强调发挥高校及其教师的主体作用,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水平。

最后,党和政府在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与此同时,高校及教师的建言献策和积极参与,能够有效化解大学生日益增长的思想文化需要同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和满意度,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大学生真正信仰的科学真理。

四、未来展望

制度分析的“背景-结构-互动”范式主张在宏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结合社会背景考察制度的演进,同时也关注制度行为主体的重要作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迫切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做出与其相适应的调整:一方面,立足“两个大局”,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全球视野;另一方面,为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对接障碍,增强课程本身的吸引力、针对性等问题,在及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回应现实问题上,延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在统一指导的课程建设下,利用制度弹性建设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

1. “两个大局”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视野的全球化

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实施多方制裁,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意图通过和平演变实现西方国家的对华意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关键课程,必须积极关注并回应这一问题,培养学生观察当代世界的宏大视野,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进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面对纷繁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党中央对世界大势和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清醒判断和准确把握,逐步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有力武器^[9]。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载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须要教育引导树立学生树立展望未来的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埋下人才种子,为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奠定基础。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不断拓展全球视野,增强课程的时代性、开放性、前瞻性。

2. 现实问题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场域的社会拓展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10],此论述深化了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创新的内涵。“大思政课”之大在于所处时代之大,所立格局之大,所担使命之大。“大思政课”突出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社会生命力,核心是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旨在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对接与转换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理论阐释和应对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与营养,因此,应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走入广阔的社会天地,在新时代的社会空间与现实问题里吸取营养。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以及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使得学校思想政治理论小课堂滞后于变化万千的社会现实。“大思政课”可依托社会空间,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与育人目标指引下,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出发,挖掘社会中丰富的育人资源,实现社会资源的课程化、知识化、专业化,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大思政课”应吸纳具有先进性、代表性的社会成员,使其成为课堂育人主体,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言传与身教相结合的育人效果,使其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构力量。在“大思政观”的指引下,使“学校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发挥学校与社会的双重育人效应,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新形态。

3. 统一整体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施主体的主体性发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在坚持立德树人目标的统一前提下,应积极利用课程的制度弹性,推动课程群建设,并针对不同特色、不同层次高校开设有差异性的课程,做到因校制宜、因地制宜。

一是积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群建设。作为国家统一课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任务,应以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目标导向,在政府主导、高校参与下构建一个以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程为中心系统、以各个学校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各类“课程思政”为子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群,并促进各子系统的多向互补,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创新性发展。

二是适当扩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自主权。每个高校,尤其是行业特色类高校都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现实基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程思政。因此,在按照思想

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标准下,可适当扩大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方面的自主权,设置与学校类别相适应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是提高课程的可选择性。就不同层次的高校而言,学校层次的划分表明了各高校学生自身差异的客观存在,这决定了他们在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的特点与规律不同。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从整体上把握学生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考虑学生个体差异,关注不同学生的思想发展水平、知识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等,在保证课程内容连贯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增设符合学生发展需求的各类选修课,并提供详尽的课程简介,减少学生选课盲目性,使学生真正选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还能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亲和力。

参考文献:

- [1] 余双好,王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历史经验及展望[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9.
- [2] 岳永华. 用好思政课新教材 扎实推进“三进”工作[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9):1.
- [3] 祁文博,田芝健.“三能一体”:思想政治理论课革新建设的逻辑探赜与协同框架[J]. 思想教育研究,2021(6):132-137.
- [4] 肖北庚.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J]. 时代法学,2009,7(5):3-13.
- [5] 教育部关于成立2021—2025年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EB/OL]. (2021-11-17) [2022-07-1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111/t20211130_583492.html.
- [6] 靳玉乐,李志超. 我国课程改革决策的特点、问题及其改进[J]. 教育发展研究,2013,33(12):1-7.
- [7] 孙秀芳. 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演进研究[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119.
- [8] 《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编写小组. 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56-94.
- [9] 王威峰,王雨菡.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际视野[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1,37(3):66-71.
- [10]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N]. 人民日报,2021-03-07(001).

(收稿日期:2022-02-25 编辑:高虹)